

丛书主编 王先明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

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

■ 朱军献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

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

朱军献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 / 朱军献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11
(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 / 王先明主编)
ISBN 978 - 7 - 203 - 08386 - 3

I . ①因… II . ①朱… III . ①城市史 - 河南省 IV . ① K 29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6503 号

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

著 者：朱军献

责任编辑：蔡咏卉

装帧设计：柏学玲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sxskcb@163. com 发行部

sxskcb@126. com 总编室

网 址：www. sxskcb. 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 75

字 数：290 千字

印 数：1 - 3 000 册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8386 - 3

定 价：50.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总序 GENERAL PREFACE

ERSHI SHIJI ZHI ZHONGGUO

20世纪的中国，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动的时代性特征之一，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传统时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逆转为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伴随着中国与西方交锋以来军事、政治与经济的挫败，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现代化（或西方化）与城市化成为显而易见的社会潮流，传统城乡“无差别的统一”为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异所代替，近代农民群体也从“士农工商”的中层政治身份一变而为“乡下人”这一饱含歧视色彩的社会底层，由此形成的城乡社会—经济与文化断裂不仅是20世纪社会结构畸形化与不平衡性的显著现象，也是至今仍横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即使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巨大的城乡分离化也不容忽视，明显的城乡对比已经成为社会认同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当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却面临种种困惑时，当乡村人才的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时，当城市化的进程突飞猛进时，当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与国际接轨时，城市人与乡下人

成为国人赫然的身份标识，现代日益扩大的城乡失衡与传统中国城乡之间的无差别的统一体形成鲜明对比时，深入研究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就成为一个理解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此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无论是政治家、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之解析为城市与乡村两大基本单位，中国近代社会之不平衡性、半封建性、半殖民性等特点均可从城市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析分中被实证；而城乡之间的关系与特征，亦成为深度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有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惊人地相似”！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破产”、“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成为举国至重的话题，到新世纪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当代“三农”话语；从1926年王骏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到新世纪以来持续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管不同时代条件下，它所聚焦的时代主题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如此一致的话语或命题的背后却应该深伏着共趋性或同质性的深层致因。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提示，即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或乡村变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荒漠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生成的一个“发展问题”。“三农”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三农”不会凸现为时代性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呈现和表达不会如此集中在“三农”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的确显示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与“三农”二者的相关性。问题在于，会是怎样的相关？如何揭示二者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并寻求最佳的或最有效的协调方略？

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社会分工、社会分化

始终伴随着城乡背离式发展趋向前行，从而整体上的贫富差距在城乡之间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不平等。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反观我国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削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事实上农民成为低人一等的群体，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的33%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相伴着工业化过程而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

“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和时代特征，如果仅仅局限于现实的考量，或将既无法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恐也难以探寻到真正的求解之道。事实上，百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主张和方案，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区域实验与社会实践，其丰富与多样、繁难与简约，已经有着足够的样本意义和理论认知价值。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思想领悟！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进程，因此有关中国乡村道路选择的理论思考和种种分歧，却依然为我们的历史反思和长时段观察提供了理性辨析的基础。

近年来，对于近代城乡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薄弱之处。学界研究的主要态势要么关注城市化历史，要么偏重于乡村史研究，城乡关系仅仅作为这些研究的副产品而出现；城市与乡村是一个预设的、对立的地域单元。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化进程还是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农耕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如何广阔而全面地呈现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并深入揭示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轨迹与规律，从而为当代中国发展的路向选择和理论思维提供丰厚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当是这一丛书设计的基本诉求或宗旨。

王先明

2013年1月7日于津城阳光100国际新城西园



目 录

CONTENTS

ERSHI SHIJI ZHI ZHONGGUO

导 论

一、百年沧桑,近代中原地区区域中心城市之变动	1
(一)旧的区域中心城市的衰落:朱仙镇、开封	1
(二)新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兴起:郑州	5
二、研究现状	9
三、本书的创新之处	20
(一)布罗代尔的视野与本书的创新之处	20
(二)关于极化问题	23
(三)关于衰落城市研究	25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27
(一)中原地区	27
(二)区域中心城市	28
(三)循环累积	29
五、写作思路与资料来源	31
(一)写作思路	31



(二)资料来源	32
---------------	----

第一章 空间之“力”

第一节 中原地区的地理空间结构	35
一、中原地区的宏观地理空间特性	35
二、中原地区的微观地理空间结构	36
第二节 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变迁	42
一、先秦以前	42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44
三、隋唐五代宋金时期	48
四、元明清时期	51
第三节 区域中心城市的分布与地理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	53
小结	56

第二章 黄河之影响

第一节 十二世纪后黄河的泛滥与影响	61
第二节 对开封、朱仙镇水运体系的破坏	67
一、开封水运体系的衰落	67
二、贾鲁河水运的兴起与衰落	73
第三节 开封、朱仙镇周边腹地土壤的沙化	79
第四节 对中原地区近代陆路交通的影响	86
小结	97

第三章 经济作物的种植与集散

第一节 土壤沙化的影响	101
一、花生的大面积种植	101
二、其他农作物收获的贫瘠	108

第二节 棉花的种植与集散	113
一、豫陕晋三省棉花的产地分布	113
二、各中转市场的区位分布与集散数量	121
三、各大棉花终点市场的区位分布	126
小结	130
第四章 商业中心的变迁	
第一节 朱仙镇的绝对衰落	134
一、商业的衰落与功能的转换	134
二、衰落程度分析	138
第二节 开封的商业变迁	141
一、城市商业功能的转化	141
二、城市商业的腹地范围	149
第三节 郑州的商业发展	156
一、商业功能与商业性质	156
二、郑州棉花市场区位的形成	161
三、其他行业的发展与城市商业的腹地范围	167
小结	173
第五章 工业发展的差别	
第一节 发展现代工业的区位优势	177
一、影响现代工业发展的区位因素	177
二、原材料区位优势	179
三、矿产分布区位的影响	181
四、市场与交通	185
第二节 朱仙镇——传统工业的衰落	188
第三节 郑州——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	195
一、发动型工业：棉纺工业	195



二、其他工业的发展	204
第四节 开封——现代工业的有限发展	207
一、榨油工业	207
二、面粉及其他工业	213
三、开封现代工业的边缘地位	217
小结	218

第六章 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政治中心的变动

第一节 朱仙镇	222
一、“市”的兴起对“城”的带动作用	222
二、朱仙镇的行政设置与影响	223
三、朱仙镇城市空间结构与“寨”的建设	227
四、政治、商业与朱仙镇之“神”	229
第二节 开封	233
一、多层级合一的区域政治中心	233
二、政治力量的支撑作用	235
三、政治都会的安全与城市的空间结构	241
第三节 政治中心之变动	245
一、近代以前郑州的行政建制与城市建设	245
二、近代开封、郑州行政建制的变动与省会的迁移	248
三、省会迁郑之后的影响	253
小结	256

第七章 城市内部结构的变动以及新动因的形成

第一节 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动	258
一、朱仙镇	259
二、开封	261
三、郑州	265

第二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	270
一、朱仙镇:城市空间的收缩与解体	270
二、郑州: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不同功能区域的形成	272
三、开封:较弱的发展动力与城市空间的有限突破	279
第三节 新动因的形成与差距的加大	285
小结	288
结 语	290
附 录	294
参考文献	301
后 记	317



导 论

INTRODUCTION

→ ERSI SHIJI ZHI ZHONGGUO

一、百年沧桑，近代中原地区区域中心城市之变动

(一) 旧的区域中心城市的衰落：朱仙镇、开封

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前，作为清时期天下四大名镇之一和中原地区商业贸易与手工业生产中心的朱仙镇，在兴盛时期有着一般县城、府城远远不能相比的人口数量、城市规模以及极其繁华的商业贸易。

朱仙镇当繁盛时，“有民商四万余户，人口二十余万人”^①。镇内街道，“东

^① 李步青等编著：《岳飞与朱仙镇》，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1934年版，第123页。关于此书中所记载的朱仙镇人口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若参照清时期中国四大名镇中的其他三镇来看，即使存在夸大的成分，也应差之不远。因为在其他三镇中，位居其首的汉口镇甚至超过百万([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5页)，佛山镇在道光年间也不低于二十六七万人([韩]朴基水：《清代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2期；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而规模最小的景德镇人口甚至也在十数万以上(周銮书：《景德镇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镇之重要市街，曰顺河街、曰杂货街、曰曲米街、曰油篓街，街俱南北行；曰晓先街、曰炮房街，街俱东西行。杂货街多南北杂货，曲米街多米麦商铺，炮房街多爆竹作坊，油篓街多油业行店，顺河街、晓先街则为普通商号，其中尤以杂货街最为繁盛。西镇之主要街市，南北行者，曰顺河街、曰西大街、曰保元街；东西行者，曰估衣街、曰京货街、曰铜坊街。京货街多苏广时货，估衣街多估衣店及当铺，顺河街、西大街、保元街则为普通商店。”^①

穿镇而过的贾鲁河沿岸多豪商大贾，舟楫往来不绝，“东南食货、西北山产、湖广米粟、江南竹磁，率以朱仙镇为会集地，再散销于华北各省，故蔚为华北各省经济中心”^②。

镇上最有名的手工业为木版年画生产，“往昔盛时，业此者三百余家，出品畅销于邻近各省，大有独占市场之势”^③。较大年画商号的画工、刻工、店员可达百余人以上，其中如德源长门面多达六间、作坊百余间，常年雇刻印工匠一百四五十人。年画制作的工艺技术也直接影响辐射到豫北地区的新乡、安阳、濮阳以及豫中、豫南的许昌、周口、驻马店、汝南等地。^④

但因黄河泛滥所引发的洪水的冲击，它的财富、盛名和影响都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渐趋低沉。

1843年，就在英国人以坚船巨炮入侵中国之后第四年的6月上旬，陕晋等省大雨连日不止，众川所汇的黄河频频涨高，浊浪裹泥挟沙激荡而下。入伏前后中牟下汛北岸因泥沙堆积而忽生滩咀，挺峙河心，直逼黄河大溜，使之南趋而冲及堤坝，新筑防水之埽全行塌没后，大溜向下直冲中牟九堡无工之处。又“偏值26日大雨，27日东北大风，鼓溜南击，浪高堤顶数尺，兵夫有力难施”^⑤。

浊浪汹涌的黄水漫过九堡堤身，由决口倾覆而下，向南奔流漫淹。最初合

① 李步青等编著：《岳飞与朱仙镇》，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1934年版，第124页。

② 李步青等编著：《岳飞与朱仙镇》，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1934年版，第207页。

③ 李步青等编著：《岳飞与朱仙镇》，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1934年版，第126页。

④ 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⑤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为一股,由中牟南泛,流至朱仙镇时,分为两股,“大溜正冲镇北,直射关庙春秋阁后。时居民皆避庙西沙岗一带,幸地势稍高得免,然河东民舍市廛已沉溺大半矣”^①。镇内贾鲁河河道淤浅,“商贾舟楫不通”^②,镇中商业因之也转趋衰退。^③全镇人口咸同年间已只有1.2万户,五六万人。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3000余户,1.5万余人。到1934年只有1700余户,8500余人。其中残废军人1500余人、商民3000余人、农民2000余人、无业者(青洪帮)1000余人,全镇人口只占全盛时期的1/24。^④镇中各业商户总计不过100余家,盛名远扬的年画生产已只有40余家。^⑤即使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数年的发展,至1957年人口调查,全镇亦不过6224人,^⑥仅仅100余年,相差之巨几难令人相信。

最终,朱仙镇就像一颗闪亮的流星,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消没在没有边际的夜空中,再也不能作为众人仰望的明星而存在。

与朱仙镇相比,邻近的开封,其鼎盛时期的繁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宋都南迁之后,就开始了其漫长的下降进程。依据下文北宋至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些人口数字,即可见其一斑。

关于北宋开封城市的最高人口数字,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尽管存在着一

^① [清]宋继郊:《东京志略》,王晨、李景文、刘璞玉点校,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页。

^② [清]沈传义、俞纪瑞修,黄舒昺纂:《祥符县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卷六,《河渠志上》。

^③ 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前的雍正元年(1723)、乾隆二十六年(1761),贾鲁河也曾多次为黄河泥沙所淤,但随之疏浚后,对其水运影响都不太大。而此次河淤影响则比较严重,对此,在咸丰年间,张昀在其《琐事闲录》卷上曾记载:“中牟河决淤垫后……己酉,因河水浅阻,复奉旨挑浚,余适督工,见河成,水深不过三二尺。”(张昀:《琐事闲录》。转引自[清]宋继郊:《东京志略》,王晨、李景文、刘璞玉点校,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页);而在《朱仙镇新河碑记》中也曾言:“往时舟楫畅行,上可抵京水镇,以故朱仙镇百货充物,会成因之,号繁富焉。自道光二十三年,河决流淤,屡浚屡塞。”(李鹤年:《朱仙镇新河碑记》,光绪壬午八月),故道光二十三年之中牟决口,实为朱仙镇贾鲁河水运以及朱仙镇商业发展兴衰的转折点。

^④ 李步青等编著:《岳飞与朱仙镇》,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1934年版,第122~123页。

^⑤ 《古今朱仙镇》,见《开封文史资料》,第一辑。

^⑥ 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公安厅编印:《河南省1957年人口统计资料》。



定程度的差别，但基本上多认为应在140万至170万之间。^①

经过500多年的沧桑变迁，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水淹开封之前，开封人口除周王府眷而外“实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是北宋崇宁时期的1/4左右。但经此水灾后“只存奄奄待毙者三万余人耳”^②，为自北宋以后人口数量的最低点。

因为崇祯十五年的水灾破坏极为严重，经过20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直至咸丰十年（1860），全城“人口共二万零一百九十三户，九万二千七百二十四口”^③，只为明朝人口最多时期的近乎1/4、北宋盛期的十之八九。其后整体趋势为缓慢上升，至宣统二年（1910），人口约有15万余人。^④此后直至1925年，总人口数才226 758人。此后又经过10年的增长，1935年为307 071人，^⑤但仍然与明时期的最高数字存在较大的差距。

此后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又有较大规模的下降。新中国成立后又趋于缓慢回升，据开封市人民政府统计调查，1952年城市规划区内的人口为237 287人、1953年为241 298人、1954年为238 101人、1955年为237 085人、1956年为235 782人、1957年为248 975人，^⑥尚未能超过1935年的数字。

依据上文不同时期开封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由北宋崇宁年间至明崇祯十五年水淹开封之前为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因宋都南迁、战乱灾害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人口数量有较大规模的下降，并于明亡之际因被黄河淹没而达到最低点，之后由康熙时期开始，逐渐慢慢回升，于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达到自明末以来的最高点，然后又开始下降，直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

^①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5页；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② 《崇祯十六年江西道御史黄澍奏疏》。转引自[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清]傅寿彤：《汴城筹防备览》，咸丰十年九月刊于大梁。

^④ 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⑤ 《开封省会未来人口之推测》，《河南统计月报》，第3卷第3期，1937年。

^⑥ 开封市人民委员会统计科：《开封市统计资料（1949—1955）》，1956年12月；《1956年度开封市经济计划执行情况》，1957年12月；《1957年度开封市经济计划执行情况》，1958年12月。

成，尚未能达到1935年的水平。整体而言，在康熙年间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阶段内，人口总量应为上升趋势，尤其是民国时期比清时期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期，人口虽然较民国时期有所下降，但1954年以后又转趋缓慢上升，若再考虑到省会迁出的影响，应该说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即使不是增长趋势，但基本上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没有较大的增长，也没有较大的减少。差别不像自北宋到明末那样大。

但即使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此阶段内，开封城市是发展状态，而不是衰落状态？仅作开封自身纵向的比较，也许可以认为是缓慢发展或者是停滞状态，但当我们把开封城市与郑州作一横向的比较时，就不能这样认为了。

郑州城市人口在1952年底为165 996人、1953年底为205 000人、1954年底为230 869人、1955年底为307 253人、1956年底为405 136人、1957年3月底为424 846人。^①在1952年，开封是郑州人口、面积的近乎一倍半，而到了1957年，郑州则已超过开封一倍半，而成为河南全省最大的城市。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开封在康熙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总人口数有所增加，但与郑州城市发展的速度相比，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却是处于一种衰落状态。尽管衰落程度不同于朱仙镇的那种幅度较大的、绝对的衰落，但也应该是一种相对衰落。伴随着相对衰落程度的加深，开封终于在1954年因河南省会的迁离，而失去了自五代以来长期居于中原地区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下降成为地域范围要小得多的区域中心城市。

(二)新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兴起：郑州

当朱仙镇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商业及手工业生产中心，进行着熙来攘往的繁盛贸易时，郑州还只是一座直隶州的州治所在，城“建自唐武德四年，城周九里三十步……东西延长、南北微狭”。城内街衢有四：“东敏德街、西里仁街、南咸宁街、北清平街”，用以交易的集市四关各一，后来移入城内。^②

^① 《对我市历年来人口增长情况的分析》，郑州市统计局档案，全宗号39，卷34。

^② [清]张钺、何源洙修，毛如诜纂：《郑州志》，乾隆十三年刻本，卷三，《建置志》。